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11.004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连东.长蛇尾上针猛虎口中剑——略论鸦片与炮舰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互补[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77-183.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11.004.



Citation Format: Lian Dong. A sword in the mouth of a tiger, a needle on the tail of a snake: On the substitut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and warships in ear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1): 177-183.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11.004.

长蛇尾上针 猛虎口中剑

——略论鸦片与炮舰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互补

连东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人文与素质教育中心,山西 阳泉 045000)

摘要:地理大发现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主权平等的现代外交准则确立之前,战争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不过,炮舰虽然可以垄断生产、控制贸易、掠夺人力和资源,但无法创造市场需求。对于中国这样无法用武力完全征服的国家,列强只能以鸦片作为最主要的掠夺手段。近代鸦片消费方式的数次变革导致吸食者的成瘾性大幅增强,从而通过“从传播到上瘾”“再从上瘾到传播”的过程反复不断地创造市场需求。可以说,列强以千万民众的财产和健康为代价,通过鸦片和炮舰两种手段的结合将全世界的财富引向欧洲,在加速欧洲工业化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关键词:鸦片;炮舰;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K14;F7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1-0177-07

发生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西、葡、荷、英、法等国相继以重商主义取代农本传统,用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开展海外殖民探险,从而发展为全球资本主义。直到19世纪末,在美国、日本“有影响力的发展”和20世纪中国“令人瞠目结舌的苏醒”之前,这种全球资本主义始终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与西方(欧洲)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分不开的”经济空间^[1]。在这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列强以资本扩张为目的、以股份公司为形式、以武装炮舰为后盾、以商品为“丝线”,逐步将原本疏离的区域串联起来,使世界范围内的财富重新分配,在推动本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引致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全球化早期,炮舰成为列强垄断生产、控制贸易、掠夺资源、增减壁垒的最重要手段。不过,炮舰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当列强面对那些无法用武力直接征服的国家时,比如中国,炮舰就有些

作者简介:连东,山西工程技术学院人文与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Email:897648820@qq.com。

无能为力了。这时,鸦片的特殊性表现出来。普通商品,如曼彻斯特的棉布,只是以其物美价廉的品质挤占他国同类商品的地位以满足市场需求。而鸦片作为瘾品,却能通过“从传播到上瘾”“再从上瘾到传播”的过程反复,不断创造市场需求。于是,除炮舰之外,鸦片也成为列强攫取全球财富的重要手段。然而,历史为什么会选中鸦片而不是槟榔、大麻、阿拉伯茶或别的什么瘾品呢?此中原因显得有些偶然,甚至像是历史与人类开的一场玩笑。答案是:把鸦片点燃。

倘若亚洲人没有受到美洲烟草吸食方式的启发而点燃鸦片,鸦片怕是至今仍是瘾品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倘若欧洲人没有把鸦片吸食与他们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立起来,欧洲怕是也难逃一场触目惊心的浩劫。当然,历史没有假设。这一切的发生皆源自人类追求刺激的天性。

一、鸦片跨国流动的雏形

布罗代尔曾说:“任何文明都需要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而这些兴奋剂注定要改变和困扰人们的日常生活。”^[2]这里讲的“兴奋剂”其实就是瘾品。在人类历史上,瘾品与人类文明的纠葛宛若光与影的双生火焰,一刻都没有分开。安第斯山民嚼着古柯对话星辰,印第安部落在圣火边传吸烟草,埃塞俄比亚的土著围坐在一起品尝阿拉伯茶,黄河边的酒杯也曾倒映着皎洁的月光,这欲望的火焰跨越时空蔓延不息,鸦片本来只是其中一簇。

鸦片取自罂粟。罂粟则发端于公元前4600年的莱茵河畔,当时主要作为蔬菜和油料。约在公元前17世纪,罂粟传播到地中海地区,随后从中提取鸦片作为药用。最晚于公元3世纪传到西亚,7、8世纪之交叉同时传入印度和中国。印度继承了鸦片药用的传统;中国却将罂粟作为观赏植物使之逐渐丧失了生产鸦片的能力。至此,该物种的传播过程戛然而止,几近千年。在禁酒的西亚穆斯林帝国崛起以后,鸦片首次作为瘾品登上了历史舞台:波斯的“鸦片茶”“库克纳”,印度的“阿玛帕尼”“泡斯塔”都在事实上扮演了烈酒的角色。经过长期的积淀,在社会需求和自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波斯、埃及、印度的恒河流域和马尔瓦高原成为5个最重要的鸦片产地。不过,因为当时的世界仍“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3],所以鸦片产地本身就是鸦片市场,几乎不存在跨国的鸦片流动。

直到13世纪,当西亚那些保持鸦片消费习惯的穆斯林开始大量移居无法种植罂粟的东南亚海岛时,从西亚和印度向东南亚的跨国鸦片流动才真正形成。但由于口服鸦片的致瘾性不强,其在东南亚土著和穆斯林移民后裔中的传播能力有限,所以鸦片流动的规模不大。14世纪末,明朝皇帝受元代阿拉伯医生关于鸦片壮阳传闻的影响开始派出宦官宠臣潜出外洋高价采买鸦片,从而首次引起鸦片向中国的细微流动。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鸦片流动的形式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即使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漫长的一个半世纪里,国际鸦片贸易的规模也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浪潮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炮舰炸不开鸦片市场

15世纪初,中国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结束之后开始削减船队和港口设施,整体商业海事活动下降,基本放弃了海权。而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欧洲国家则恰恰相反,他们跨越重洋,开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扩张。此时的欧洲在军事建设和远洋技术方面已经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形成了优势,甚至也可以说,欧洲国家海外探险活动的成功是以武力为基础的。

中国发明的火药传到西亚。在公元1100年至1280年这段时间里,西亚演化出70多种适用于不同目的的火药配方并制造出火炮,这在伊斯兰教打败欧洲十字军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5世纪的欧洲则将从西亚学到的火炮技术运用到远洋帆船上,再配以航海星盘、十字竿和象限仪等航海仪器,从而为海上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然,武力上的优势仍可归结为专利保护、技术培训、资金投入回报、冒险精神、科学观点、普遍的异端宽容和宗教等思想制度层面若干因素导致的结果^[4-5]。

葡萄牙是最早在亚洲建立霸权同时也最早与跨国鸦片贸易建立联系的欧洲国家。1498年,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1500年,卡伯拉尔率领的第二批葡萄牙舰队就在从事香料贸易时顺便将一批印度鸦片运回里斯本销售但遭受冷遇。1509年,葡萄牙舰队依靠火炮优势击败穆斯林舰队,确立了在印度洋的海上霸权。从1510年到1535年,葡萄牙人相继夺取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达曼、孟买、第乌并控制了南洋贸易要冲马六甲。至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已经建立起一个从几内亚、刚果、安哥拉、莫桑比克、索法拉、基尔瓦到索科特拉、霍尔木兹、西印度、马六甲、澳门、长崎的绵延2万多公里的线状海上商业帝国。这不仅意味着葡萄牙控制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贸易的主导权,同时也意味着葡萄牙操纵了印度马尔瓦鸦片的出口贸易,并通过其贸易网络使之成为东南亚和中国市场的主流品种。

17世纪初,荷兰开始向葡萄牙的霸权发起挑战,先后在爪哇和马六甲两次打败葡萄牙舰队,继而又在万丹、班达、亚齐和印度建立了商馆。当时东南亚的苏门答腊岛、班达群岛、摩鹿加群岛、安汶岛、爪哇岛都有鸦片需求,荷兰人就从马六甲采购鸦片运往这些地区。1619年,荷兰从英国人手中夺取爪哇的查雅卡尔塔,随后将其改名巴达维亚并作为经略东方的总部。1641年,荷兰在柔佛的协助下攻占马六甲,拦腰切断了葡萄牙的海上帝国,但同时也阻止了马尔瓦鸦片向马六甲的输入,所以荷兰只能将目光投向孟加拉。从1659年起,荷兰人开始将训练好的锡兰象卖给孟加拉商人来换取鸦片和其他商品,再把这些商品销往锡兰、马六甲和马来群岛换取香料和锡、金、银、珍珠、珍珠母、海蛞蝓等物资,从而使孟加拉鸦片取代了马尔瓦鸦片在东方的市场地位^[6-8]。

截至此,欧洲列强已经在地理大发现后长达150年的时间里通过侵略性、外向型的战争资本主义方式初步将全球融为一体^①。经济全球化速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美洲的白银、可可、橡胶、烟草,亚洲的香料、茶叶、丝绸、瓷器,欧洲的毛织品、金属,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起来。然而,鸦片跨国流动规模非但不能与这些大宗商品相提并论,甚至整个东南亚一年的鸦片贸易货值都很可能不及欧洲人从中国离开时捎带采买的半船干姜。以荷兰人的贸易数据为例:在夺取马六甲前夕的1640年,每年可以从马六甲进口向东印度群岛销售1.3箱马尔瓦鸦片;在已经控制马六甲的1659年,每年仍然只能从孟加拉进口8箱鸦片销往东印度群岛^{[9]74}。由此可见,虽然炮舰可以帮助欧洲人控制国际贸易,但无法直接提升贸易规模,贸易规模的大小是由市场本身的需求决定的。口服鸦片不仅没有强烈的致瘾性而且口感“苦辣和臭恶”^[10],因而并不能征服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味蕾。最终使鸦片成为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还是其本身消费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① 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提出“战争资本主义”的概念,并将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等作为其核心特征(《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三、鸦片成瘾与鸦片的跨国流动

美国学者考特莱特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普通瘾品经过某种特殊方法处理后会效力倍增从而引起大规模滥用,如葡萄酒蒸馏成白兰地、古柯叶提取出可卡因^[11]。鸦片也没有能够逃离这个“魔咒”。在20世纪全球性的海洛因成瘾之前,鸦片消费方式经历过三次变革,由此引致三次广泛的鸦片成瘾和三次持续时间、贸易规模不等的跨国鸦片流动。

第一次大范围的鸦片成瘾肇始于17世纪中叶的爪哇或苏门答腊,波及范围涵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南部。起因是当地人受烟草吸食方式启发,将烟草与鸦片拌和后用烟管吸食,称作“鸦片烟”。经此一变,鸦片的成瘾性大增,据说“一日辍饮,则脱神欲毙”。由此,1678年荷兰人在东南亚的鸦片销售量暴增到420箱,是1659年的50多倍,至1748年已达1360箱^{[9]74}。大约在1710年,“鸦片烟”传入中国福建的漳州、泉州、厦门一带,后又传入台湾。短短20年后,中国的鸦片进口达到200箱,迫使雍正皇帝颁发“鸦片烟”禁令。但该法令仅针对“鸦片烟”贩售,鸦片作为药材依然可以公开买卖,这使禁令效力大打折扣,到1767年,中国进口的鸦片量稳步增加到1000箱^[12]。

第二次大范围的鸦片成瘾大约发轫于18世纪80年代的广东,波及整个中国并在19世纪后逐步外溢到南亚、东南亚、西亚、欧洲、澳洲和北美。起因是广东人对“鸦片烟”进行改造:去掉作为主要成分的烟草而单吸鸦片。这一消费方式在提升鸦片成瘾性的同时还大幅增加了鸦片用量,需求猛增而供给不足,导致中国市场出现量价齐升局面。于是,孟加拉鸦片像洪水一样流向中国,东南亚市场则几近枯竭。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英国取代荷兰控制孟加拉鸦片、葡萄牙操纵着马尔瓦鸦片、美国则购买西亚鸦片,他们围绕中国市场展开激烈争夺。到1835年,中国鸦片进口量达30000箱^{[9]136}。在这种情形下,虎门销烟、鸦片战争和中国的鸦片合法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相继发生就不足为奇了。来自中国土产鸦片的竞争使印度输华鸦片在1879年达到创纪录的107970箱后开始震荡下行,到1900年时下滑到49201箱。与之对应,中国鸦片的产量在1906年时高达584800担,占世界总产量的90%,占国内总销量的91.5%^{[13]236-249}。

第三次大范围鸦片成瘾的开端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此引发了从西亚到美国的跨大西洋鸦片贸易。1806年吗啡的成功提取和随后的商业量产为此次鸦片滥用提供了基础,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吗啡滥用和战后商业宣传为此次鸦片滥用提供了契机。19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吗啡已经不能自给,开始从波斯、土耳其大量进口鸦片用于吗啡制造。依据人均数据^②和美国当时的人口规模测算,到19世纪末美国年均消费鸦片约260吨,按印度鸦片的包装规格大约为4000箱。

这三次大范围的鸦片成瘾引发的跨国鸦片流动相互交织,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才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列强以武力控制了全球的生产与贸易,而以鸦片为代表的瘾品则成为他们撬动中国等非鸦片生产国市场的利刃。鸦片不仅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而且导致了一场全球范围的财富转移。

四、鸦片流动背后的大国博弈与利益分配

当鸦片烟发明的時候,荷兰人控制着南洋贸易和东南亚市场。荷兰人借助鸦片烟的力量攫取

② 该数据取自美国学者戴维·F·马斯托所著《美国禁毒史》,周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了巨额利润,售价达到收购价格的168%。仅1678年,荷兰人从中获利近7万荷兰盾;到1740年,年利润达80万荷兰盾,仅此一年的获利已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之初的注册资本,鸦片由此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单一商品^[14]。

当鸦片烟传入中国之际,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依托,使马尔瓦鸦片顺利占领中国市场。令清政府聊以慰藉的是,英国继荷兰之后于1716年开始大规模采购中国茶叶。茶叶等大宗商品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抵消了鸦片输入引起的逆差,这才使康雍乾三代“圣主”的颜面得以保留。不过,中国却由此“不自觉地成为了经济全球化链条中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一环”^{[15]6.44}。

英国通过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控制了孟加拉,随后又在1773年垄断当地鸦片。虽然英国人的介入并没有改变当时的鸦片流向和规模,但却使荷兰丧失了鸦片贸易的主导权。18世纪80年代后,单吸鸦片方法的传播使中国市场一家独大,英国为独占中国市场开始“南征北战”:为掌控全局,于1795年占领马六甲;为阻止美国人把西亚鸦片运往中国,于1830年对由海路经停孟买的鸦片开征高于中国市场售价的过境税;为阻止葡萄牙人把马尔瓦鸦片放行中国,从1803年到1829年,用26年时间封锁印度西海岸。囿于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美国人屈服了,但葡萄牙人在信德土邦的配合下最终在1830年成功突围。于是,英国不得不与葡萄牙、信德和马尔瓦诸邦展开一场以“物美价廉”为营销手段的“公平对决”。低价鸦片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染上毒瘾,引发白银大量外流,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看客”最终沦为这场对决的“牺牲品”^{[15]173}。英国则恰恰相反,成为这场博弈的最大受益者:鸦片年收益从1773年的不足4万英镑增加到1835年的132万英镑^{[13]89,166}。虎门销烟是清政府被迫的奋起,鸦片战争是英国人暴力的回应。于是,至少在经济贸易层面,清政府的这场禁烟运动如沙漠里的一场春雨般了无痕迹。

1843年英国吞并信德,最终结束了孟加拉鸦片与马尔瓦鸦片整整四十年的对抗;1858年清政府实行鸦片合法化,又开启了中国鸦片与孟加拉鸦片长达半个世纪的竞争。到20世纪初,“物美价廉”的中国鸦片达到孟加拉鸦片产量的10倍不止,使鸦片从印度向中国的流动几乎停顿。在这场“巅峰对决”中,英国人虽然盛极而衰,但依然榨取了巨额财富。粗略估算,从1860年到1907年,英国人累计鸦片获利不少于3亿英镑,足够开凿20条苏伊士运河。可以说,鸦片是成就19世纪英国霸权的重要基础。滑稽的是,清政府也是这场对决的受益者。粗略估算,清政府从1865到1907年收取的鸦片进口税、土药厘金不少于1.7亿海关两^[16],若再加上土药烟亩税、落地税和关税等大项收入,足够购买150艘铁甲舰。可以说,鸦片是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救命稻草。不过,如果不考虑货币增量的话,财富终将是守恒的,英帝国和清王朝的日进斗金完全是以千千万万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民众失去健康和家庭破产为代价的。

鸦片的流动总是与财富的流动方向相反,但财富并不总是向着拥有炮舰的一方流动。当吗啡在19世纪后半叶流行美国之际,缺炮少舰的波斯和土耳其也能从美国大捞一笔。1860年,波斯鸦片的年产量只有10万磅,而到1881年超过100万磅。此后,波斯鸦片的出口额长期占该国出口总额的25%以上,占全球鸦片贸易总额的5%~10%。1899年后,日本也开始从波斯进口鸦片销往台湾或加工成吗啡销往中国大陆。波斯在美国和中国两个市场的带动下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鸦片生产国。土耳其也不甘示弱,在20世纪初达到年产鸦片150~540吨的能力,主要销往北美和欧洲,奥斯曼政府借此获得60.8万英镑的收益^{[9]200}。

大规模的鸦片流动在20世纪初开始减弱,至20世纪中叶才趋于停歇^③。而就在这鸦片的末日黄昏里,日本军国主义发起了最后的疯狂。它通过“以毒养战”策略用中国鸦片掠夺中国财富,总额高达3.5亿美元,为其延续侵略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持^[17]。

结语

现在让我们再次拓宽视野,重新审视鸦片与炮舰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

近代东西方发展差距的形成或始于明代。宣宗以后,中国因为忙于应对瓦剌等漠北势力开始收缩海权;欧洲将思想制度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后开始向海外扩张。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广阔舞台,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主权平等的外交规则建立之前,炮舰就是全球化的规则,因而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血与火的武力基础之上的全球化。炮舰为欧洲人夺取殖民地和殖民地上人民的劳动成果,也使欧洲人控制了全球的贸易网络,还让全世界的财富向欧洲奔涌,从而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过,炮舰的作用是有局限的:它可以使印第安人毁灭,可以使非洲黑人成为奴隶,但只能使东南亚人成为顺民,只能使中国这样的大国保持开放。很明显,炮舰并不能帮助欧洲人直接掠夺中国的财富,即使是面对一个开放的中国。

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很长时间里扮演着欧洲市场供应商的角色而非欧洲商品的市场。欧洲人需要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等大宗商品,而中国“实在不需要从外面购买哪怕是一分钱的东西”^[18]。由此,欧洲人在中国市场的大门外徘徊了一个半世纪的时光。终于,横空出世的鸦片成为欧洲人解锁东方宝库的钥匙,“长蛇”做到了“猛虎”都做不到的事情。因为鸦片烟的传播和单吸鸦片方法的发明创造出“无中生有”的市场需求,使得自给自足的中国被硬生生地拖入经济全球化的漩涡之中。

鸦片的大规模流动导致中国的财富直接或间接地流向欧洲,这种财富转移有助于欧洲资本扩张和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助于欧洲军事力量的提升、工业品向世界的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而有助于巩固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当然,鸦片流动导致财富流动是复杂的。即使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这样的财富输出国而言也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造成了单一的破坏。在这些国家整体财富外流的同时,还引发了复杂的内部财富再分配。以中国为例,掌握鸦片分配网络的清政府、大商人、地方实力派都是鸦片贸易的受益者,他们积聚的资本也可能投入实业从而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

总之,在17世纪中叶鸦片烟出现到20世纪中叶全球化规则真正确立的近400年间,鸦片消费方法的变革使之偶然地成为了炮舰之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手段。它的大规模流动直接影响了全球财富的分配,在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和炮舰一起成为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痛苦根源。

往事如烟,愿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再是吞噬弱者的巨浪,而是照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温暖阳光!

参考文献:

[1] 雅克·阿达. 经济全球化[M]. 何竟,周晓幸,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52.

③ 整个毒品贸易的规模至今仍不容小觑,直到1997年,包括海洛因等鸦片类毒品在内的非法毒品贸易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甚至超过合法的钢铁贸易(*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167)。

- [2] 费尔南·布罗代尔.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M]. 顾良,施康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306.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 [4]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 谢延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49,252.
- [5] 杰弗里·萨克斯. 全球化简史[M]. 王清辉,赵敏君,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33.
- [6] Owen E D.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7.
- [7]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 Final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 Historical Appendices[M]. London: Eyre and Spoitiswoode,1895:6.
- [8] Trocki C A.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M]. London: Routledge,1999:39.
- [9] 连东. 鸦片罌粟通史:欲望、利益与正义的战争[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 [10] 曹炳章. 鸦片癮戒除法[M]. 上海:上海中医书局,1930:39.
- [11] 戴维·考特莱特. 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M]. 薛绚,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0.
- [12]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M]. 张汇文,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98.
- [13] 连东. 鸦片经济: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为视域(1602—19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4] 沈燕清. 荷印殖民政府鸦片税收政策及其对爪哇华人社会的影响[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32,39.
- [15] 仲伟民.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16] 王宏斌. 禁毒史鉴[M]. 长沙:岳麓书社,1997:223,267.
- [17] 王宏斌. 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263.
- [18] 赫德. 这些从泰国来:中国问题论集[M]. 叶凤美,译.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40.

A sword in the mouth of a tiger, a needle on the tail of a snake: On the substitut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and warships in ear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ian Dong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Center, Sh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gquan 0450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have opened up a tru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diplomatic norms of sovereign equality, war w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capitalism into global capitalism. However, although warships could help the powers to monopolize production, control trade and plunder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hey couldn't create market demand. For countries like China that couldn't be completely conquered by force, the great powers could only use opium as their primary means of plunder. The several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opium in modern times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ddiction among users, thus creating market dem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from transmission to addiction and from addiction to transmission repeatedly.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powers, at the cost of the wealth and health of millions of people, used a combination of opium and warships to channel the wealth of the world to Europe, accelerating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also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opium; warship;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 周沫)